

全球對話

Global Dialogue



NEWSLETTER

GDN 4

Tahrir Square 的革命時刻

Mona Abaza

阿拉伯革命： 誰是行動者？

Sari Hanafi

橫濱一 希望之港

長谷川公一

- > 挑戰世界主義
- > 不平等
- > 墨西哥的執行委員會會議
- > 無國界社會學
- > 土耳其社會學會20週年
- > 歐洲各國的社會學會
- > 歷史一隅：1982年，墨西哥
- > 人權：社會學家犯了什麼罪？

第一卷 / 第四期 / 2011.4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 主編的話

從上一期到現在，世界變了很多。開羅受到全球的矚目。阿拉伯的暴動—我們還沒辦法確定是不是革命—才剛剛發生不久，讓大家無法預測社運何時會發生。我們比較瞭解它如何散佈、展開、存續。因此我們有兩篇主要談革命過程的文章：Mona Abaza認為那就是於2011年1月和2月時在Tahrir square裡面及周遭所發生的事情；Sari Hanafi則檢視了突尼西亞和埃及要求社會改革的行動者組成。

第三篇文章把我們從人類的動盪帶到了天然的地震中，是有關日本大地震及相關的核能意外。環境社會學者長谷川公一15年來不斷質問是否真要等到另一個車諾比事件發生後，日本才願意改變現今的能源政策呢？答案我們也不曉得。作為2014橫濱大會的當地籌備會主席，長谷川教授在墨西哥向執委會報告了日本如何應變這次的地震與海嘯。我們全文刊出。對此，執委會再次保證2014年大會將會圓滿成功。

我們也登出了執委會在月21-25日的會議記錄，以及Raquel Sosa Elizaga副會長所主辦之討論不平等的國際會議。Jennifer Platt在歷史一於中記錄了1982年墨西哥世界大會的情形。這是ISA第一次在「第三世界國家」舉辦會議，也開啓了全球社會學這樣的議題。例如，這期的Sujata Patel也從許多不同民族的觀點去剖析全球社會學和世界主義。此外還有來自歐洲社會學會的報導，也有土耳其社會學會的介紹，以及無國界社會學美國分會的簡介。最後則跟各位報告了土耳其和匈牙利的社會學家遭受人權迫害的例子。

我們持續去拓展我們的讀者群。現在我們也有臉書了，網頁也更新了，加入了Digital Worlds的部分。透過Sari Hanafi、Mounir Saidani、Ishwar Mod的幫忙，全球對話也發行了阿拉伯和印度文版本，總共有9種語言。社會學已經動起來了！

> 本期內容

主編的話 2

Tahrir Square的革命時刻 3

阿拉伯革命：誰是行動者？ 6

橫濱：希望之港 9

> 辯論

挑戰世界主義 12

不平等 14

> 會議與學會

墨西哥的執行委員會會議 15

無國界社會學 17

土耳其社會學會20週年 18

歐洲各國的社會學會 19

> 特集

歷史一隅：1982年，墨西哥 8

人權：社會學家犯了什麼罪？ 20

ISA website

facebook

Cover Photo by Mona Abaza



Tahrir Square 的和平抗議
Photo by Mona Abaza

> Tahrir Square 的革命時刻

by Mona Abaza, American University of Cairo

1月25日在埃及的開羅上演了一場關鍵的示威活動，而我人正好在場。第一場示威活動我並未參與。我已經積極地介入政治已經好幾年了，而我必須承認，我是因為在好幾次的示威活動中看到了許多的暴力事件，所以才開始對街頭運動卻步的。

從第一天開始，政府就對示威者進行殘酷的鎮壓。從第一天就參與活動的朋友回憶到整起暴力事件：橡皮子彈、水柱、催淚瓦斯等都是被用來對付示威者的武器。整座城市都起火了，催淚瓦斯的濃濃臭

味瀰漫了好幾天。到了1月25日，報導指出有3人死亡，多人受傷。

穆巴拉克已經癱瘓了整座城市的鐵路。這個愚蠢的控制方式一點也沒有辦法阻止抗議民眾繼續向城市湧入。的確，1月25日後，街頭上的群眾一天比一天多，示威活動也越來越頑強，人們也陸陸續續地佔據了開羅的所有街道。這些人都是要去Tahrir Square的，整個開羅市也因為警察局被攻擊而漸漸崩毀了。此時歹徒也無所不在，搶劫事件頻頻發生。只要警察越使用暴力鎮壓，示威者就會越堅定，人數也會越來越

多。其他城市，像是Alexandria、Suez、Port Said、Mansura、Mahalla al Kubra等的情況也跟開羅類似。在開羅，示威者從Shubra、Mattariya、Bulaq、Dokki、Mohandessin Nasr City、Heliopolis等地出發，並佔據了Six of October和Kasr al-Nil等橋樑，暴力衝突也都被記錄下來。對於政府的暴力鎮壓，不滿的情緒日漸升高，反對的信念愈易堅定。大家都說這次事情將有所不同。反對者不再恐懼，用自己的身體和集體的祈禱去抵抗警察無情的鎮壓。接著不久後，反而是警察由於恐懼害怕而撤退了，因為他們對於這些堅毅不拔的反對者束手無策。所以警察不敢面對強大但和平的群眾力量，一下子所有警察就都跑光了。開羅市民某天一大早醒來發現居然一個警察也沒有。可是接著軍隊便開著坦克車進駐。

許多和我一樣不是政治運動者、害怕暴力事件的人，最後也都決定要遊行到Tahrir Square。許多中產階級的媽媽們一湧而入。我朋友的兒女體驗到了一種巨大的人生變化。這些把他們各自的父母帶到街上去的年輕人往往在第一天就參加活動了。這些人在廣場找到了自我。也有許多年輕人對於學到很多和政府交手或對抗的技巧而感到很自豪。

第一次壯觀的百萬人運動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埃及人自己也深受影響。這是追求自由、渴望尊嚴的集體儀式。兩百萬人和平的走上街頭，走向Tahrir Square，這樣盛大卻井然



有序的遊行景象簡直筆墨難以形容。整個遊行組織很壯觀，年輕的籌畫者掌握了遊行的秩序，邁進並穿越廣場。這點相當重要。更令人訝異的是抗議的人們彼此互相關照，所以不會出亂子。廣場則被軍隊的坦克包圍著，檢查每個人的身份防止有心人士趁亂打劫，並禁止武器攜入廣場。在檢查站那裡，男人和女人被隔開，也因此由年輕的、高度自律的反政府組織者所組成的「人民委員會」所掌控住。隨身背包和皮包都要接受檢查，刀子、剪刀等危險物品一律沒收。當政府的威脅持續增加，檢查站也隨著增設。整個遊行廣場被人民所組成的隊伍小心翼翼的圍繞保護著。

> 2月2日的血腥鎮壓

對我和我女兒來說，2月的第二天是個無法忘記的日子。前一晚，穆巴拉克以邪惡且威脅的語氣發表第二次電視談話，堅持不下台，彷彿他的憤怒馬上就要降臨這個失控的國度。次日下午，我和我的兩位朋友走向廣場，我女兒則要去與友人會面。Samia建議我說可以去Pierre家，因為他那邊在一棟公寓大樓的9樓和10樓，可以望向整個廣場，以及Talaat Harb和Bab al-Luq等街道。大約4點的時候，政府派出的暴徒開始從埃及博物館的方向攻擊群眾。我看到許多重傷的人被抬出檢查站，他們頭部和眼睛都被射傷。一場駱駝的戰役(The battle of the camels)已經展開，然而幸運的是抗議者成功地逮捕了進入廣場的駱駝和

馬。那時我的兩位朋友決定回到我們所處的Zamalek島，我和我女兒開始擔憂，並覺得走回去的風險太大。目睹這一樁景象，餘悸猶存。

大約5點半時政府的爪牙從Talaat Harb Street大量湧入廣場，並開始丟汽油彈，向廣場民眾開槍，焚燒所有東西。他們還特別向車子開槍，好可以把車子翻過來。我們很清楚地可以看見軍隊並未阻止這些行為，所以反政府的群眾只能自衛，或是從正在整修中Hilton大飯店那找來金屬物品當作防禦工具。至於攻擊武器則只有石頭而已。整個街道上一片混亂，傷勢慘重。據報導，那一夜有4人死亡，上百人受傷。很顯然地真實的死亡人數比這個還高。幸運的是最後政府派出的暴徒並未得逞。

我們整晚都在Pierre家的公寓中。Pierre則忙著把剛從陽台上拍到的上百張照片上傳到臉書上。而這一天也是網路被封鎖5天之後第一次恢復使用。Pierre的那迷人、頹廢、美好的公寓儼然成了政治犯的庇護所，地上到處都是床與毯子。

這兩間公寓變成了客棧。許多法國、美國、義大利、埃及的記者和攝影師都來此投宿，甚至還包括青少年示威者的母親，以及當事態演變得血腥暴力時來避難的年長者。廣場上的抗議人士之中，有些是我大學教過的學生，看到他們，我相當欣慰，卻也相當擔心，尤其是知道了當他們決定要與政

府抗戰到底之後。我其中一個最傑出的女學生在廣場上露宿4天，看起來已經筋疲力盡；有也年輕人也是我朋友的兒女。我們也會歡迎那些不認識的抗議者來公寓投宿。當暴力衝突增加後，來的人也多了，大約50到60人，其中有些人臉部及手腳都掛彩了。

其中有一間房間裡的電視聲音不絕於耳，大夥都不斷地進進出出這裡。有些累到不行的人甚至就睡在電視前面。我們所有人都瘋狂地在反覆做下列兩件事：在3個大陽台上徘徊，隨時關注Tahrir Square、Talaat Harb、Bab al-Louq街道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然後跑回電視螢幕前，看新聞如何報導，好掌握政府下次鎮壓的訊息。Al-Jazeera頻道可以讓我們知道廣場外圍發生什麼事情。我們沒辦法看到來自Antiquities博物館的攻擊，也沒辦法看到Six of October bridge那邊政府的手下如何用汽油彈攻擊示威民眾，但是這些景象可以透過電視畫面得知。而這也讓我們很擔心整個城市將會陷入一片火海。電視是我們唯一可以判斷情事是否危險的管道。無論如何，在公寓中的所有人都對穆巴拉克同仇敵愾；我們也都同樣知道：今晚的屠殺只是穆巴拉克拒絕下台的第一步而已，若再持續個一週，後果一定不堪設想。這個人已經喪心病狂了。

我們幾乎所有人都保持電話開機，每一位母親也都一直打電話給廣場上的孩子們，告訴他們電視報導的內容。有些母



親乞求孩子趕快離開那裡。記者也打電話給他們在衝突中失去聯繫的同事。

另一方面，廣場也聚集了通宵鎮守的人群。女人和小孩就睡在廣場中間。一些嗓門大的示威者就在Omar Makram清真寺的周圍大聲呼喊宗教口號，其他則大聲吟唱60年代的愛國歌曲。深夜裡，某個特定的時間點，抗議者開始有節奏地拍打金屬物品。種種的這些聲音代表了示威者的組織有多麼地緊密。某種不和諧的旋律就是表示即將有危險到來。這些噪音具有警示的功用，特別是當我們把無時無刻盤旋在廣場上空的直昇機也考慮進去的話。

許多住在Pierre家中的媽媽們都一直在等她們的小孩離開廣場。當我們在看新聞報導時，她們都哭了。一位母親在電話中苦苦哀求她的女兒趕快放棄抗議；我則緊緊地守在女兒身邊，並祈禱這一切趕緊結束。

> 蔓延效應

當我在撰寫這些回憶時，我女兒成了我最好的嚮導，幫我努力記起2月2號之後所發生的事情。但我們卻也似乎有同樣的問題，就是無意識地記憶模糊。我們都認為這是因為當時情勢太過於緊張、和不斷地在觀察廣場和關注電視之間來來回回而導致。我女兒把在Pierre家的那晚，稱作為超現實主義的時刻。無論如何，有一件事情很明顯：就是電視畫面佔據了我們的腦海，影像甚至取代了真實。

若是Adorno和Horkheimer目睹

了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在埃及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那麼他們一定會再好好想清楚何謂文化工業以及電視所帶來的庸俗化。顯然，若沒有衛星頻道揭穿政府的面具和荒謬的謊言，這場革命不會成功。而且當網路被封鎖，臉書不能使用，行動電話無效時，衛星電視更顯其重要性。

未來幾年，學術界必定會熱中於研究半島電視台在阿拉伯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革命的成功也是半島電視的成功。電視記者也毫不隱藏地透露他們對於街頭革命的支持。他們靈巧的活動，聰敏地預知辦公室被搜索，以及其所經歷的政治迫害，無一不正在塑造他的英雄形像。

這種傳染性的反抗精神遍及了突尼西亞、阿爾吉利亞、埃及、葉門、巴林、利比亞、阿曼等國，並震驚了全世界。這也顯示出電視傳播訊息的迅速。燒遍了阿拉伯世界的這把火有共同的根源，也圍繞在尊嚴、認同、正義、貪腐、君主政體等議題上而展開。

埃及人向來以其機智和樂觀而著名，因為如此，這場成功的革命也吸引了廣大的公眾和西方世界的注意。的確，這是一場流血革命，但卻又不太像。電視評論員一次又一次地重複說，對於音樂家和舞者而言，廣場是一個反文化與大眾藝術想像的新生地。著名的埃及諷刺notka (笑話)和最令人訝異的即興公共表演藝術，在廣場上建立了他們的全盛時期。

這場革命給西方世界上了一堂世界主義和民主的課。對於全球地南方而言，這兩者已經不存在很久了，託辭通常是這些國家還不太成熟。這次革命再次證明了這兩者並非西方世界的特權。當埃及68運動發生時，同時在德國也展開了關於種族基因和整合土耳其人的辯論(由偏狹的Sarrazin所發起，請見全球對話第3期，Helma Lutz，從世界主義到公共社會學)。

或許現在還不是時機把埃及革命拿來和蘇聯或中國革命比較，但是讓這場革命如此吸引人的，是因為臉書、手機、twitter等媒介有效地傳播資訊所導致。這也揭露了這樣具爭議性的新科技—被認為是消費文化的產物—如何被用來幫助對抗殘暴的君主政權。然而，科技終究只是媒介，和資訊不同；媒介和速度有關，而資訊才是街頭上所發生的事情。許多人都對廣場上年輕人所發明的口號和標語感到好奇。Manuel Castells正確地指出，網路空間的興起開啓了網絡社會了一個新的面相。他論及了新的資訊語言和新的符碼。這些明確的標語聚集了成千上萬的群眾，有些只是幾個簡單的字，像是「irhal」(走開)和「baatel」(非法)。這會是Castells筆下所預言的新電子符號語言或是簡寫語言所導致的結果嗎？顯然，我們無從得知。 ■

> 阿拉伯革命：誰是行動者？

by Sari Hanafi,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執行委員



Photo by Mona Abaza.

綠色(上方)：革命直到勝利！

紅色(下方)：我們窮人將會定義革命，也將會定義暴徒和官員。

過 去四個月以來，政治動盪震驚了整個阿拉伯世界，突尼西亞和埃及的總統已經相繼因為人民發起革命而被迫下台，並且這股潮流正蔓延向葉門、巴林、利比亞、約旦、敘利亞等國。不管我們怎麼定義何謂革命成功，總之，這些革命很明顯地迫使了執政者在政治上做出改革。

這些革命起因於對社會改革與民主的渴求。我們別忘了，突尼西亞的革命有其歷史根源：兩年前在Gafsa，發動了一場抗議糧食短缺與失業的社會運動；在Jarjis的突尼西亞異議部落客和臉書使用者紛紛要求釋放政治犯和開

放言論自由。不論是在突尼西亞或是埃及，革命都是由年輕的大學生和工人階級所引發的，他們所訴求的也是社會與民主的改革。

這些運動者對於失業的敏銳、新自由主義與君主世襲政體的敵意，都與其對正義、尊嚴、自由的渴望有關；他們要求參政自由、言論自由、宗教自由、批評爛政客的自由。別忘了，所謂突尼西亞的經濟奇蹟，只是北部沿海城市的崛起，從不包括南部的內陸地區。阿拉伯的青年發現他們已經變成了義大利哲學家Agamben筆下的Homo Sacer，所以，這是一場赤裸生命的反擊，是手無寸鐵的飢餓身軀的抵抗，因為國家機器完全剝奪了他們的身份與權利，例如，他們無法加入伊斯蘭復興運動(al-Nahda)、突尼西亞共產勞動黨、穆斯林兄弟會等團體。



突尼西亞的總統本阿里，和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儼然就是獨裁者。他們決定何時可以實施法律、何時可以終止法律，人民性命的生死也操之在其手上，徹底違背了各項人權理念：違法逮捕、刑求、謀殺、甚至拖垮整國的經濟。

在我去年編的這本書The State of Exception and Resistance in the Arab World中，突國的社會學家Mohsen Bouazizi描述了該國年輕人對於政治現狀的沈沒反對，以及如何地冷漠與不聞不問。然而，他卻忽略了Mohamed Bouazizi這樣的人：來自和Mohsen一樣的城市Sidi Bouzid，與社會如此格格不入，最後卻變成這場革命的一用Touraine的話來說一主體。

Mohamed就像其他多數年輕人的身體一樣，是獨裁政權覬覦的對象：最終要完全剝奪其政治身份。所以，Mohamed選擇以自殺式的手段來表達對獨裁政權的抵抗，而這樣的效果則在他自我犧牲的那一刻被彰顯出來。如巴勒斯坦學者May Jayussi所言，我們和巴勒斯坦同為天涯淪落人；當巴勒斯坦人民在被佔領的土地上與佔領者對抗，而佔領者百般想要羞辱他們，任意剝奪其生命，於是巴勒斯坦人起身反抗。Mohamed Bouazizi和其他的殉道者一樣，其實是思慮審慎的行動者；他們犧牲生命的目的完全是為了推翻獨裁政權。

然而，儘管本阿里不斷地壓迫和使用例外狀態，這樣的政體也不是毫無破綻，可以隻手遮天。壓迫統治通常是一個政府軟弱的象徵，就像我們可以看到如此「崇高」本阿里也無法控制自己手下的軍隊與警察。這個政府無法完全把異議消音，特別是那些少數團體的聲音。因此，也就出現了一道希望的曙光，使民主成為可能的選項，並學習如何去利用政體的脆弱不堪翻轉整個秩序。

這些阿拉伯世界的革命的確具有象徵上的重要性。埃及的革命份子通常都是受過教育的年輕男性與女性、穆斯林與基督教徒。他們一邊使用最新科技上網，一邊手持著自製的運動標語。而這樣的革命是非常在地化的，沒有美國或其他國際組織的浮誇口號，或是精美陳置在五星級飯店的手冊。另一方面，獨裁政體的支持者則騎著駱駝、拿著刀子、磚塊、棍棒而來。

而在這些革命之中，以阿之間的衝突也沒有缺席。埃及和突國作為協調軸心國(the axis of moderation)的一員，其政治論述與民意大相逕庭；人民認為協調就是准許以

色列的殖民計畫與佔領加薩走廊。我們會很驚訝的發現即使是支持政府的報紙，al-Ahram，也對穆巴拉克在1月4日接待以色列總理的作為有所批評；而前一天，以色列才轟炸加薩走廊，毀壞東耶路撒冷的4間民房，造成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所以，以色列之所以擔憂阿拉伯的革命，其來有自。新的政府將有民意的基礎，而不需西方強權的介入。甚者，埃及有可能重新恢復其在阿拉伯世界的主導地位，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對抗以色列的殖民計畫。我在訪談時，受訪的運動者不斷提及「尊嚴」，這也正是獨裁政府長期從他們身上剝奪走的東西。總之，這些革命給了我們新的啓示，讓我們重新去思考正在阿拉伯世界發生的是什麼樣的社會運動，以及內部與外部的行動者如何互動。

> 社運的行動者

在這些革命中，有兩種行動者是關鍵。第一是受過教育、獨立的年輕人。他們巧妙地結合政黨和工會組織，給了這些革命強大的動員能量。第二是工人階級，不論是工會成員與否。許多分析者往往忽略了後者，輕易地以為前者是不隸屬於任何階級，或是不帶有任何意識型態的。事實上，在這兩國發生的革命運動是傳統的階級運動和新民權運動的合流。除了階級認同，運動者也在社會整合與非整合之間建構自己的身份認同，也就是Touraine所謂的承諾與非承諾。例如，某些四月運動的參與者同時也是穆斯林兄弟會的成員，但是他們也對兄弟會很快地就和政府談判這個舉動有所批評。

在突尼西亞，Mohamed Bouazizi的行動激起了一波新的反抗，成為非組織性的自發運動，但卻也馬上被工會所控制主導。突國的總工會很擅長與政府交手。像是在北部，特別是首都，工會領袖一直在與政府談判，但是在南部的工會卻相當反對。此外，律師公會也努力地讓參與運動的成員可以從年輕人拓展到所有年齡層，從地區到首都突尼斯。我們可以發現，從埃及到巴基斯坦，律師甚至是法官在此次革命中都相當活躍。

至於埃及，革命起始於第六次四月運動，在Al-Mahalla和al-Kubra由年輕人與罷工一起展開。他們用臉書、twitter、手機簡訊動員了成千上萬的群眾，在1月25日那天走上街頭，並由政治反對力量的幫助，在開羅的al-Tahrir Square、Alexandria、Swiss、Zakazik、Mansoura等地聚集



了百萬人。每個參與者都變成了記者，用手機記錄了政府的鎮壓行爲，並躲過政府媒體的控制。的確，在運動發生其間，政治權利和民權的訴求超越了意識型態的分野。執政者，甚至是阿拉伯或是西方的學者都認爲只有伊斯蘭政治組織有辦法動員群眾走上街頭。這如今的例子則顯示出，若伊斯蘭組織不和其他反對團體合作，終究難以成事；伊斯蘭運動必須超越類似這種「伊斯蘭本身是邁向民主自由的唯一途徑」的簡單口號，並和其他反對運動結盟。

至於人權團體或非政府、非營利組織呢？許多贊助者和國際組織都認爲這些非政治化的組織團體才是政治變革的主要推手。而事實上這些組織也扮演著輔助的角色，傳播訊息、報導傷亡人數、遊說國際強權，在正式與非正式的管道上，都有助於反抗獨裁政權。因此，公民社會最主要的功用就是與政治反對勢力協力合作。所以現在那些只強調NGO角色的人，除了要避免過渡膨脹NGO的地位，也要強化他們與其他組織的合作，賦予新的任務。

與東歐和中歐的革命不同的是在阿拉伯世界的革命團體並沒有一個單一的領導者。然而我們也見識到了沒有領導中心的革命、沒有組織的群眾是如何自我改良的。大眾媒體雖然不是最重要，特別是國內公家的媒體一在地誤導大家時，我們會發現它扮演了傳遞資訊的關鍵角色。1月26日，埃及電視台還播出烹飪節目，彷彿什麼事情都沒發生一樣。其他的媒體，例如Al-Jazeera、BBC Arabic和France 24則播放由運動者所記錄的影像，並提供新聞分析。我必須指出，Al-Jazeera已經從對阿拉伯事務的「不介入立場」轉變成為和阿拉伯人民站在一起，表達對政治的不滿。

> 下一步

最後，我們只能希望這次成功的革命是邁向民主的開始——民主化是一條佈滿荊棘的道路。進一步，人民或許開始知道他們不再只能在獨裁者的利益和伊斯蘭激進組織的恐怖之間做出選擇。毛澤東言猶在耳：「通往天堂之前的是混亂，這是個最好的情勢」。況且還要和掌權的軍隊勢力談判，可以預期的是，通往未來的道路仍然會相當顛簸崎嶇。 ■

> 歷史一隅

by Jennifer Platt, 出版副會長

正值籌備在墨西哥舉行的年度會議(3月21-25)，且將與墨西哥的同事座談，那麼，現在來寫一篇ISA在墨西哥的歷史是再適合不過的了。1990年代以前，雖然拉丁美洲的ISA個人會員數只佔了總體的4%，但是他們在執行委員會或研究委員會中的代表比例卻不少，向來也總會有拉丁美洲的代表。Gino Germani (阿根廷，副會長，1962-6)和Fernando Cardoso (巴西，會長，1982-6)是最有名的兩位。第一位墨西哥的會員是Francisco Zapata (1978-82)，從智利逃亡出來，他是被Alan Touraine所提名的；第二位則是Jorge Gonzalez (1994-8)。

值得一提的是1982年在墨西哥市舉辦的世界大會，會長是Ulf Himmelstrand，大會主題則是「社會學理論與實踐」。當地籌備委員會由Gerardo Estrada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擔任會長。參加的人數遠遠超過預期，所以必須臨時印製大量議程；更重要的是，參加的人數絕對不只限於註冊的人數而已。

學生對於會議的形式與內容都相當反對，因爲只有少數的論文是處理墨西哥自己的問題。當時，對美援貶值以及銀行的國有化都是很尖銳的問題。對墨西哥來說，社會學不只是一門學問，也是引領政治行動的一門知識。所以會議就臨時在同一個會場中加開了討論墨西哥社會議題的場次。而會議中幾乎全程使用英語這點也飽受批評。在會場有許多人抗議、要求翻譯成西班牙語(當時還不是ISA的官方語言)；其中一個口號是：「Cervantes yes, Shakespeare no」；其他場次也都被要求要這樣做。ISA的經費當時無法(現在也是)進行同步學術口譯，但是少數場次有提供給學生翻譯服務。(Artur Meier是大會報告的撰寫者，說這不只是語言衝突而已，還是關於美國霸權與帝國主義的文化、民族認同展現)。在1990年馬德里的世界大會也有過同樣的問題，最後ISA把西班牙文列爲官方語言之一。 ■

> 與日本的社會學家站在一起

ISA執行委員會在此對日本大地震和海嘯的罹難者表達最誠摯的慰問與弔唁之意。我們相信，日本將會以堅忍不拔、團結合作的精神度過這場難關。我們也向日本社會學做出承諾：2014年在橫濱的世界大會一定會順利舉行。我們充分瞭解到這次盛會將會是百年來日本社會學的巔峰。另外，我們也特別感謝正值焦慮與痛苦之際，兩位日本社會學會的成員，分別是會長矢澤修次郎和ISA大會當地委員會的主席長谷川公一，仍設法出席在墨西哥舉行的會議。長谷川教授向執行委員會提供了完整的事件報告，我們在此全文刊出：



Disaster Prevention Center.
Photo by Koichi Hasegawa.

日本的東北海岸線本來是很美的，但是海嘯來襲後，摧毀了每一個港口，沖垮了每一棟木造房屋，只剩下殘破的鋼筋支架。這張照片是南三陸町小鎮斷瓦頹垣的景象，那棟三層樓的半毀建築是災害防治中心。3月11日那天發生地震時，約有工作人員有30多名，但最後只有包括鎮長在內的8人在屋頂上奇蹟地獲救。其他人都不幸罹難，包括了一名負責廣播要居民趕緊撤離的員工。她的廣播救了很多，但是自己卻沒能逃過一劫。圖中新設立的電塔，代表了他們不願向大自然低頭的精神，也代表了他們重建日本的決心。

> 橫濱一 希望之港

長谷川公一，東北大學，仙台，2014世界大會當地委員會主席

3月11日下午，毀滅性的地震與海嘯重創了日本東北的太平洋沿岸地區，我所居住的仙台市則是受創最嚴重的地方之一。我和我的家人幸運地逃過一劫。地震發生時，我正在處理ISA世界大會的預算問題。原本平靜的星期五頓時之間成爲了災難日，前所未有的強震衝擊了我和我的家人，以及整個地區。我的書籍和檔案掉落一地，一瞬間我就困在這些掉落後疊了將近一公尺高的書堆之中。即使已經兩個星期過去了，我仍然無法置信。這似乎是電影的劇情，不是真實的界。

日本就像舊金山和洛杉磯一樣，經歷過好幾次大地震。日本正好處在四個板塊的交界上，所以某種意義上，地震經驗就是整個日本社會的歷史，而且日本人都很習慣了，總是做好萬全準備。但是誰都萬萬沒想到東北部會

發生連續多次的強震——5分鐘之內發生了3次大規模地震，這也是爲什麼由9級地震所引發的海嘯來得如此迅速與猛烈，造成了令人無法想像的嚴重災情。

然而，若從地震的強度和次數來說，這個史上第4大的地震對人口密度如此高的日本社會所造成的損傷已經是最小的了。我們的社區所建造的都是可耐震的建築，且學校和民眾都定期地演習預防地震和海嘯的措施。

至今沒有發生任何動亂與搶劫，我感到相當驕傲。即使在最嚴重的區域、或是在東京，人們都井然有序地排隊領取食物、水，和等待慢分的地鐵。許多國外記者對於日本這樣的文化、秩序在災難發生時仍依然不變，感到印象非常深刻。

目前，2個星期過去了，已經有1萬人死亡，大部分在沿

海地帶；1萬6千人失蹤。這是日本當代史上最嚴重的天然災害。

我們難道要等到下一個車諾比事件發生後才，日本的能源政策才會改變？

我們許多人都很擔心福島的核能反應爐，我也和其他環境社會學家一樣堅決反對日本的能源政策。1996年我發表了一篇批判性的文章，名爲A Choice for a Post Nuclear Society，呼籲政府終止核能計畫。每當我受邀去演講這個題目，我都會問一個問題：難道要等到下一個車諾比事件發生後才，日本的能源政策才會改變？很不幸地，我15年前的擔心如今卻成真了。日本政府並沒有從三哩島事件、車諾比事件、或其他相關事件中學到教訓。很遺憾，也很無力。

> 會議場地很安全

我可以瞭解大家很擔心2014





長谷川公一，東北大學，仙台
2014世界大會當地委員會主席

年在日本舉辦的世界大會，而我在這也要告訴大家：你們屆時一定會想來看看日本是如何從災難中復甦的！日本的歷史就是一步克服天然災難的歷史：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1945年二戰後的廣島與長崎的原子彈，以及1995年的神戶大地震。

我們會議所在地橫濱，以及場地橫濱平和國際會議場(Pacifico Yokohama)並沒有任何地震發生的歷史。在地震發生後，橫濱市告訴我說該棟大樓可以耐強震，且定期監測安全性。我們會議場地完全可以抵擋住地震的衝擊。並且橫濱從未發生過海嘯。過去152年，只有幾次大浪的紀錄，而且沒有造成任何災害。橫濱海灣的形狀讓海嘯很難進入，民眾對地震也有周延的準備。

> 盡力準備

當地委員會將盡力做好一切

當地籌備委員會由全國性的學者所組成，團隊早在2008年就開始運作。17名成員來自日本各地，專精於各個領域。我們在日本社會學會和ISA執行委員會的合作過程中，充分學到了哥登堡的寶貴經驗。至於會議場地則有兩棟大廈，80間會議室，從一個會議室到另一個會議室之間路程最多不會超過10分鐘。

我們提供了5個會議議題：

- 自然與人為災害，當地社會的復甦。
- 低生育率、高齡化社會、變遷中的性別關係
- 公民社會：
CSOs、NGOs、社運
- 東亞脈絡下的壓縮現代化與全球化

- 社會學的研究與教學

這些議題和大會的主題「面對不平等：全球社會學的挑戰」非常貼切。我們將會強調東亞的視野，並和韓國、中國、台灣的學者合作。

> 希望之港

橫濱平和國際會議場座落於Minato-Mirai，意思是「未來港」，也有「希望港」的意思。橫濱向來是連接東西方、北亞和東南亞的中樞，是美洲和亞洲、亞洲和全世界的橋樑。對於年輕人來說，這是通往世界希望之港；許多人也滿懷著希望來到橫濱。橫濱是日本的全球化都市，她多元、善變、充滿活力，和各位印象中整齊畫一的日本有所不同。

我們唯一擔心的是人數問題。上一屆哥登堡有5000人參加，我們深怕因為地震所帶來的負面觀感，使得人數會大幅下降。

但我相信各位不是搖椅上的社會學家，而是勇敢探索社會真實面貌的學者。請大家鼓勵你們的同事、朋友、學生來參與2014年的社會，來見證日本如何從災難中復原。你們的承諾參與將是日本社會學會的最大動力。請一定要來，來親眼看看日本社會的復甦。讓橫濱再次成為希望之港，成為勇敢的社會學家面對不平等世界、思索出替代方案的應許之地。橫濱大會是屬於大家的，謝謝你們的支持！ ■

> 多元典範下的全球社會學

by Sujata Patel, University of Hyderabad, 印度

全球對話開啓了一場關於全球社會學的有趣辯論。我主要是想針對Ulrich Beck的「世界主義轉向」(全球對話1:2和1: 3)和Raewyn Connell的論點(全球對話1:2)做出評論，並主要著重在以下三個主題上面：方法論世界主義、方法論國族主義、全球社會學。

如同Craig Calhoun所言，世界主義是個流行的概念。我不打算以各種典範來解釋這個字，而是以最普遍常見的觀點去理解它：意味著一種以各種形式去承認「他者」；或是如同刊物Public Culture在2000年的主編所說的：在這個廣袤的網中，他抓住了某種互為主體性的意義與情境。毫無疑問地是只有當我們承認相互性與差異性，我們才可以在社會學分析的層次上，去結合Beck筆下所說的各種互斥的觀點(南方與北方觀點)。

我的問題是：為什麼Beck的方法論的世界主義沒有辦法承認來自南方的社會學理論呢？類似的問題，不只在Connell的南方理論中討論過，也被其他許多來自全球南方的學者闡明過；而且這已經是一種學術的附屬品，其意義在社會學教育和學習的過程中已經被不斷地發掘出來。不論在課程中、在研究中、在期刊或書本文章的審查中、在發表或是何謂學術的傑出表現中，都可以發現其身影。

為什麼這樣的一種學術附庸性是如此普遍的呢？答案很多。我們可以從殖民主義和知識的形式開始討論起。然而，在殖民主義沒落後，以「被迷惑的心」(Syed Hussein Alatas的用語)之形式所表現出來的知識形式仍然相當普遍，也開啓了許多現代性與社會學的理論討論。許多學者都認為歐洲和北美的社會學理論仍然很族群中心，其歐洲中心主義限制了一種完全包容的知識形式(或許人們有時稱它為世界主義)。

歐洲中心的觀點以其自己的觀點去瞭解自己，認為自己從啓蒙而來，開創了理性和人文主義的主體。有了理性和科學，人類便可以征服時空，確保人類進步得以持續。像是Arif Dirlik所指出的，歐洲中心主義意味著歐洲內部的文明進程，而不把現代性當作是一種經濟制度(資本主義下的生產體制)、政治形式(民族國家的系統、以法律確保其地位)、社會組織(階級、性別、種族、族群)、或是文化實作(休閒或過好生活)；其不但是從歐洲內部浮現的，還透過了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才得以實現。可是歐洲的學者並不是從與殖民主義的關係來看待這個問題，而是以其內生的歷史與語言之觀點去解釋。這樣的觀點持續被用來解釋在歐美第二現代性的發展，以及方法論的國族主義。

>方法論國族主義

對於方法論國族主義的批評主要以兩個概念為主，分別是空間與地點。理論家企圖在分析上將這兩者加以區別，可是通常在使用時都會產生混淆。空間，指的是社會相互關係總和的一種抽象概念；地點，是一種物理位置，透過混合的社會關係而產生一種真實地點的社會意義。隨著時間變化，這些地點會延伸出去，以意識或是相關的象徵意義去認同自己(例如城市Buenos Aires或是民族國家South Africa)，然後這些認同會建構出一種凝聚力，用來和其他地點/領土做出區別，例如像是國族(新加坡和馬來西亞)、超國族(印尼和荷蘭)、或是地方城市的認同(Tahrir Square)。

方法論國族主義混淆了空間與地點之間的複雜關係，這一點，當其不斷地強調民族國家、民族性、民族主義等概念只會對社會科學有負面影響時(不論是在理論或方法上)，尤

其明顯。在那些曾是殖民強權或是帝國的國家(如法國或德國，也就是社會學的開山鼻祖的國家)，上述批評或許成立，可是並不代表全世界都適用，因為，在被殖民之前的國家裡(如印度)，民族或國族主義的論述是有正面影響的。若我們對於印度社會學的發展歷史有所研究，想必這一點就不難理解。

在印度，民族主義的論述曾經被用來質疑殖民主義的論述、質問在殖民主義觀點下的人類學如何偏頗地把印度貶低為非現代的國度。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在獨立前後，被用來審視那些殖民觀點下關於印度社會的理論，檢視其如何從外來者的眼光去看待印度，並提供一個內在的視角，產生新的社會學語言和歐洲的理論相互抗衡。當民族現代性的計畫展開時，民族主義觀點的社會學也在這個計畫與發展的過程之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所以，在印度和其他前殖民國家，方法論國族主義從地點/領土的概念出發，並對抗殖民主義的論述。對地點的認同也讓這個國家的知識分子可以對抗外來的殖民主義知識體系。再者，如此一來，產生的凝聚力也產生了論述的其他方案，並成為後來知識系統在政策和規範上全面制度化的原則。而這樣的政策則決定了教育的內容與標準、研究機構的建立與執行、研究經費的核准、溝通思考的語言、專業組織的成立、以及獎學金的設立等。

這樣的歷史系譜應該與辯論中一直強調方法論國族主義負面影響的論點放在一起來對照與評價。方法論國族主義不但沒有限制了全球社會學的理論視野，反而還把它拓展了。另一方面，這樣的觀點也讓我們讓是到了全球社會學論述下隱藏的不平等結構，脈絡化主流知識體系的建構過程。這點如今仍然是很重要的。

我並不是說要把社會學侷限在地點/領土或是民族主義的層次，也不是要給方法論找麻煩，而是主流的社會學已經弱化了那些少數

的、地方的聲音與經驗，並將之邊緣化為西方的附庸。若20世紀末的社會學質疑國族這個概念，那他同時也是在宰制和普遍化其自身知識的基礎。所以一個開放性的問題是：我們應該建立什麼樣的概念，才可以容納解釋那些矛盾衝突的宰制/被宰制的過程(這過程也造成了知識體系的分殊化)？

>全球社會學？

當Beck問：「社會或政治理論要如何可能在理論、經驗、方法、規範上，敞開視野去處理這種複雜且又質疑自身存在的現代性呢？」我是贊成他的。我們或許可以爭論的是：「複雜現代性」這個概念是否適合用來檢視自15世紀以來這個被資本主義體系結構化的世界；但是很清楚的是我們必須向前看，並拋棄自18世紀以來把世界簡化成普遍(歐洲)/特殊(被殖民、民族)的二元理論。同時我們也要避開那些存在於我們文字與語言之中、且曾經迷惑人們的普世理論。

很不幸地，「世界主義」或「全球」等概念，在歐洲現代性之中有著很長的一段歷史，並且承載了過多歐洲的歷史與意義。我比較傾向使用「多元」(diversities)，因為在包括英語的每個語言之中，它記可以代表簡單的差異，也可以代表知識論與本體論上的根本區別。象徵上，它也代表了分散，而非同質化。此外，在影響上(如本體論)，這也可以避免把各個知識系統化約或是視為是他者的同類。而且這個概念也仍然有著相互關係的內涵，並且透過這個相互性的條件去建構自身。這個條件被各種空間/地點的動態與權力的網絡所結構化。個體上，這沒有所謂的好外；集體上，仍然是多元、差異、普遍但是相互連結的。他們代表且定義了自己，然後去評價各種社會學理論與實踐上的差異。

現今我們所面臨的挑戰就是去開創這樣的一種語言和知識基礎，當權力網絡推動這樣多傳統的社會學時，好讓我們能夠可以辨識它。■

> 面對不平等：墨西哥的國際性辯論

by Raquel Sosa Elizaga,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 計畫副會長



Goran Therborn, 計畫委員，在 UNAM 的會議上發表關於社會不平等的演說

2011年3月21日，ISA在墨西哥是召開執委會，會中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政治與社會科學系的教授集合了墨西哥、拉美、以及世界各地的學者們，一起針對不平等進行辯論。在三篇演講裡面，Micheal Burawoy會長、Rolando Cordera和Göran Therborn探究了不平等研究在社會科學中的範圍、起源、發展，以及對當代世界的啓示。

三個小組討論包括了來自各地的18位學者對於不平等、知識不同的社會與文化表現形式、不同地區的觀點等的理論議題，進行了相當全面的介紹。我們也討論不平等加深的危險、如何組織社群對抗不平等，因為過去近30年來，這個問題不斷地惡化。

從一個批判的角度而言，我們正徘徊當代文明發展的十字路口上，濫用天然資源、破壞環境、

危害到了整個人類與地球的存續。從戰爭與災害的經驗來說，所有的參與者都一致瞭解和承諾要避免過度掠奪資源，然後尋找一個可行的替代方案，才可能保護人類的生存。

在每一個場次裡，複雜交織的不平等現象，諸如歧視、種族主義、對女性的暴力、對邊緣需要的無視、否認文化多元性、新族群的興起、派系與階級等等，都被提出討論。我們是可以善用各個國家的講者(印度、南非、墨西哥、拉美、黎巴嫩、日本、美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西班牙、菲律賓、瑞典、法國、俄國、英國)對於不平等的理解與知識的。這其實是對在多元文化脈絡下的不平等的程度和意義進行一次很有啓發意義的審視。這也敦促我們不但是要找到自己的解釋，還要提出解決辦法。

最後，討論的重點還包括了正義的概念，涵蓋了John Rawls、Amartya-Sen，以及社會學者Göran-Therborn、David Harvey、Pierre Bourdieu；我們對於不平等與排除的關係、不平等與暴力、不平等與權力、不平等對公共領域組織之影響等議題的理解，也顯示了我們的學科觀點的確有其限制。此外，我們迫切需要社會學積極地介入公共辯論中。

總之，這是我們對於不平等所舉辦之論壇、工作坊、研討會等的第一部，而且2012在Buenos Aires的世界論壇與2014年的橫濱大會將會延續這個議題。這應該能帶給現在正在復甦中的社會學一個嶄新的方向！ ■

> 執行委員會會議 2011年3月21-25日，墨西哥市

by Michael Burawo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會長



ISA執行委員會 UNAM, Mexico City
的植物園內合影

究委員會、會員的關係上，皆希望如此。所以我們會定期在全球對話中刊出會議報告，就像這份文件一樣；此外也會跟大家報告執委會的重大決議事項。我們也會討論政策制訂和審議的原則，以及如何解決利益衝突的問題。

我們一致同意設立一些委員會去處理社會學家的人權問題，社會學家的早期生涯，ISA的獎項，以及ISA加入其他國際組織等議題。

以下是各位副主席的報告總結：

Margaret Abraham，研究副主席：

研究協調委員會(RCC)在墨西哥市的會議成果頗豐。我們處理了在哥登堡會議時所討論出的問題，包括要將RCC的目標與要求上線，成立RC的會員人數下限從25人提升到50人、工作團隊(WG)則是25人。Margaret Abraham報告了關於Congrex (以RCs、WGs、TGs為基礎)以及2012年Buenos Aires的論壇。RCC討論了這些議題和其他RC的相關問題，還有RC51的選舉。此外，也處理的兩個TG的新計畫：(1)制度民族誌；(2)理性與社會。前者已經通過，後者仍在審理中。會議的重

ISA的執行委員會在墨西哥市召開了為期5天的會議，主要由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的政治與社會科學系的教授所接待，其中特別感謝Fernando Castañeda Sabido博士，是墨西哥社會學會的會長，以及Raquel Sosa Elízaga博士，是ISA的計畫副會長。5天的會議從計畫委員會會議起頭，然後是出版副會長Jennifer Platt主持的出版委員會會議，接著財物與會員委員會會議由Robert Van Krieken所主持；國家聯絡委員會則是由副會長Tina Uys召開；研究委員會會議是副會長Margaret Abraham所主持。整個執行委員會在最後2天召開全體會議。同時，其他各個委員會也都舉行了精彩的會議，透過墨西哥和ISA的社會學家，一起處理「面對不平等：當代世界的挑戰」此

一議題，設想在橫濱的世界大會可能會討論什麼樣的議題。

我在會議中報告了在哥登堡大會獲選為會長後到各個國家拜訪的經驗，以及本會的數位世界之進展：通訊《全球對話》目前每天刊出6期，以9種語言發行；開放大學「全球社會學Live!」；致力於行動的Sociotube；以及我們的部落格：危機中的大學。這些現在都被廣為接受，而且我們還有臉書的專屬頁面，吸引了很多人前往。我特別強調了由全世界年輕社會學者所組成的工作團隊角色。

我一部份對於數位世界的信念是在創造出更大的開放性與透明度，不論在執委會的運作、或是與國家學會、研



點還是放在RC的計畫審查以及2011的經費申請。

Jennifer Platt, 出版副會長

ISA其刊載投稿、銷售、傳遞的方面都運作得不錯。但是編輯的工作量增加了，而且某些地區性的經費補助被刪減。現在有一個成功的標案，用來補足多出的支出。有一冊書將會出版東北亞學者的翻譯文章，以配合2014年的橫濱會議。

在截止之前，沒有人申請成為International Sociology Review of Books的編輯。我們決定延長申請時間，並鼓勵各位踴躍申請。Current Sociology的編輯為作者開了一場工作坊，並在墨西哥召開了一場「與編輯會面」的會議。相關的活動將盡可能地在各個會議和訓練活動中舉行。

Raquel Sosa, 計畫副會長

2014年的橫濱大會由會長、研究和國家學會的副會長、4位執行委員、當地籌備會的主席、6位各個領域的專家、學術傳統或是地區的代表所組成。此大會委員會由計畫副會長擔任主席。主要任務是規劃橫濱的會議主題，組織各個場次，作者面對批評者的場次、整合場次等等，以呼應大會主題：面對不平等，全球社會學的挑战。

第一次會議，計畫委員會決定了議程和4個議題：不平等的多元分析、不平等的動態、正義相關議題、解決不平等的替代性方案。我們希望這樣的方向可以刺激研究委員會和國家學會，將為學術

知識注入豐富的能量，處理當代最迫切的問題。

Tina Uys, 國家學會副會長

國家學會聯絡委員會(NALC)討論了定期團體會員的申請和網站的發展、區域會議的經費。從阿根廷、孟加拉、愛爾蘭、黎巴嫩和莫三比克的社會學會已經被核准通過加入。會員也被指派去聯絡新的會員國。

當在討論經費申請時，我們認為去釐清兩項經費的用途是相當重要的。網站發展經費是用來協助各國學會去建立網站用的。網站的更新相對來說就不太重要。我們也決定各國學會用ISA的官方語言之一建立網頁。地區會議的經費是用來提供給跨區域或跨國對話用的。這兩種經費都核准給予阿爾巴尼亞社會學會和吉爾吉斯斯坦社會學會。西班牙和葡萄牙學會則獲准拿到了一個地區會議的經費。我們也決定進度報告和經費的申請核准狀況要在接下來的會議中討論。

2013的NALC會議計畫已經開始對外徵求。我們也開始討論可能的議題。最後，NALC認為作國家學會的歷史、會員、活動、結構、限制，可以對國家學會有所助益。

Robert Van Krieken, 財務與會員副會長

本委員會再2011年3月22日開會，並在25日向執行委員會報告。在考慮過一些會員議題，諸如A、B、C三類的終身會員會費的區隔，B和C類會員增加之後，次級委員

會的會員身份等議題，將在2012的EC會議中提出討論。

就像NALC一樣，財政和會員委員會同意了定期團體會員資格的申請。兩個將要舉辦的會議：2012在Buenos Aires的論壇和2014年的橫濱大會，其合約和預算的問題也被提出討論。

我們也決定為在更新會員身份時的捐款做好準備。2011年的暫時性預算將會依照國家學會、研究委員會、會長的全球對話、出版委員會的經費申請情況而作調整。

最後，我們會公布2010年的預算總結。

其他事項

我們討論了前往聯合國 (Jan Fritz、Rosemary Barberet、Rudolf Richter)，法律社會學國際機構(Ramon Flecha、Benjamin Tejerina)、全球發展組織(Emma Porio)等組織之代表的報告；我們也聆聽了Tina Uys關於Johannesburg博士生實驗室的進展；也整理了來自日本社會學者關於凝聚力和2014年橫濱大會的解釋。最後更謝謝地主熱情好客的招待，以及ISA秘書處不辭辛勞地安排整個會議。ISA將與更多的會員與活動一起向前邁進！ ■

> 無國界社會學

by Judith Blau,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無國界社會學
Alberto Moncada, 無國界社會學會長



† Judith Blau, SSF會長

無國界醫生(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 SSF)毫無疑問是全球化推動下之無國界運動的先鋒。這樣的名單我們很難窮盡，但也代表了運動的廣泛性：建築師、小丑、工程師、農民、僧侶、音樂、報導、足球、老師等都有無國界組織。

無國界社會學(Sociólogos sin frontera; SSF)便屬於這個普及的運動。它於2002年在西班牙成立，然後拓展到其他國家，如巴西、智利、伊朗、義大利、馬來西亞、波多黎各、美國等。就如同其他無國界組織一樣，其使命的重點在於對於世界上的每一位其他人都有責任，並著重在人權、民主、經濟平等、永續發展等方面，並對帝國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有很深的批判。由Michael Burawoy所倡議的公共社會學則是我們相當歡迎的概念。

在合理的程度上，社會學變動得很慢。幾十年前，主導美國社會學學術界的實證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鮮少遭受

到質疑。但是在1970年代，女性主義(美國的Sociologists for Women in Society; SWS)和非裔美人觀點(美國的Association of Black Sociologists; ABS)興起之後，情況就有所不同。美國社會學會(ASA)的馬克思主義小組也常常提醒著我們世界是很大的。ASA新成立的小組也並非中立的，像是老年與生命歷程；利他主義、道德、社會連帶；小孩與青少年；行動不便與社會；教育等小組。我們很難想像研究孩童的學者對於社會福利是毫無立場的，而且有些學者是真的非常為孩童的福利著想的。換言之，公共社會學在美國學界是相當普遍的。

那麼SSF的美國分會在美國的社會學界又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呢？第一，我們有一個全球的線上討論區(<http://ssfthinktank.org/>)；第二，我們在美國人權聯合會有組成顧問，推動科學的發展，這是ASA無法做到的。第三，我們可以「遊說」ASA，這也是ASA自己沒辦法做的。已經有兩個提案決議被ASA

執委會審核通過，分別是人權宣言，和遭受危險的社會學家保護案。我們也出版自己期刊：Societies without Borders (<http://societieswithoutborders.org/>)，和本會宗旨符合，是免費開放的。

我們獨立於ASA (但是好朋友)是很好的，也我們「無國界」的精神相符。我們可以處在比較不同的位置去行動。那我們贊成資金和資源自由流動到全球南方嗎？當然。我們贊成終結帝國與霸權嗎？當然。我們反對私有化嗎？當然。我們贊成人自由地遷徙，不受國界的限制嗎？當然！ ■

> 編輯委員

主編：Michael Burawoy

執行編輯：Lola Busuttil、August Bagà、Genevieve Head-Gordon

副主編：Margaret Abraham、Tina Uys、Raquel Sosa、Jennifer Platt、Robert Van Krieken

編輯顧問：Izabela Barlinska、Louis Chauvel、Dilek Cindoglu、Tom Dwyer、Jan Fritz、Sari Hanafi、Jaime Jimenez、Habibul Khondker、Simon Mapadimeng、Ishwar Modi、Nikita Pokrovsky、Emma Porio、佐藤嘉倫、

Vineeta Sinha、Benjamin Tejerina、伊慶春、Elena Zdravomyslova

區域編輯

阿拉伯：Sari Hanafi、Mounir Saidani

巴西：Gustavo Taniguti、Juliana Tonche、Pedro Mancini、Fabio Silva Tsunoda、Juliana Oliveira Carlos、Andreza Galli

印度：Ishwar Modi、Rajeev Gupta、Rashmi Jain、Uday Singh

日本：芝 真里、塩谷芳也、姫野宏輔、高見具広、速水奈名子、岩館豊、池田和弘

西班牙：Gisela Redondo

台灣：何經懋

> 慶祝土耳其社會學會20週年

by Birsen Gökçe, 土耳其社會學會長



Birsen Gökçe 在土耳其20週年年會上發表演講

學會最重要的活動是舉辦全國會議。至今已經辦共6次，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安托尼亞社會系學者合作研究土耳其的社會經濟問題。這樣的大會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知識交流平台，也提供了前輩和年輕學者一個溝通管道，或是讓從不同地區或和相關學科來的學者齊聚一堂。

第一次會議是「當代社會發展」，1993年在Izmir的Ege University舉行，也就是學會成立的3年後。第二次是1996年在Mersin University討論「移民」。第三次是「土耳其與世界的新社會學挑戰」，在Eskişehir的Anadolu University (2000)舉辦，強調異化、衝突、整合。第四次在2003年Sivas的Cumhuriyet University舉辦，主題是「土耳其的社會問題」。第五次是2006年在Malatya'nın Malatya University。2009年是第六次，在Adnan Menderes University討論「社會轉型與社會學方法」。

社會學一開始是哲學系下的附屬品，並毫無反省地套用西方社會理論，也無視學生其實不太瞭解、並感到陌生疏離的事實。今天情況有改善，因為我們都用科學的方法去檢視問題。的確，當代社會學用了社會科學中各家方法，是有可能集大成的，但不幸的是相關的其他學科如經濟學、法律、心理總是忽略土耳其的社會現象。

如今社會大眾因使用社會學這個名詞，是因為它具有某種魔力。記者、專欄作家、政客、

任何人都想成爲是社會學家。其實我們應該要知道，人不是因爲生活在社會中學習，就會成爲社會學家的。我們常聽到一種說法：我在鄉下出生，但我對鄉村社會學一點概念也沒有。

我們的目標是用社會學幫助年輕人，在公共場合傳播社會學的理想。有了這些社會學理解，社會學研究所的學生就假定了學術訓練和給予政策制訂者建議的重要性。

在「5年發展計畫」的這段期間，社會學的畢業生是否有工作、以及是否在公部門工作，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但是，由於1980年就業法案的變遷，社會學研究生失去了許多公職的機會。學會從一開始就企圖去反轉這個結構。即使是今天社會學碩士也只能在特定的6個公共機構任職而已。上個月，在歷經了漫長的政治過程後，國家通過了法案，讓更多的社會學畢業生到各種公部門工作。

21世紀才剛剛開始，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呢！所以，我們要煥然一新。最後我想強調的是我們必須克服在推動社會學普及化到社會時所面臨的阻礙。

謝謝大家的參與，祝學會20週年愉快！ ■

(本文爲演講的簡短版)

土耳其社會學會在1990年於Ankara成立。一開始只有40名會員，如今則已經多達600人。該學會沒有任何分會。20年前成立時就因其國家級的科學研究而享譽名聲。

本會已經執行了22項研究計畫，舉辦過20場會議，出版22本出，和非政府組織開過很多次會了。甚至從1998年開始我們就在土耳其文和英文的期刊Journal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出版了130篇科學文章，包括了10項翻譯和8項研究計畫。

除了推動學術研究，學會也傳播知識，重視與社會的互動。我們也和許多自發性的組織、基金會、學會合作，投身與社區的相關活動。我們也和國家與國際的組織一起從事研究。在這個觀點下，學會受到了家庭與社會研究部、安那托利亞地區發展部(GAP)，和健康部的支持，進行研究案。學會也受到來自於土耳其科技研究部(TÜBİTAK)、聯合國國家發展部(UNDP)、歐盟、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北約(NATO)、世界銀行的支持，進行多向研究案。

> 歐洲各國的社會學會組織

by Roberto Cipriani, ESA國家學會會長

2010年10月28日，來自21個國家的社會學會代表到巴黎參加歐洲社會學會組織的會議，歐洲社會學會(ESA)的會長Anália Torres、前會長Claire Wallace、ESA的執行委員會皆出席此會議。歐盟執行委員會的科學、經濟、社會研究所的主任Jean-Michel Baer和來自歐洲科學基金會的Rifka Wehuizen。

ESA有兩大主幹：研究網絡會(Research Networks)和國家學會(National Associations)。在法律上，國家學會扮演了ESA重要的角色，因為他們負責提名執行委員會和會長的候選人。

在這裡簡短報告一下國家學會的特色。

歐洲各國的社會學會

- 德國社會學會有2500名會員，並提供團隊研究的基礎。的確，他們在這幾年變得很專業，在歐洲推動學術的角色上相當積極。
- 挪威社會學會在透過網絡連結人們這點上，貢獻良多。
- 土耳其社會學會在1990年成立，有500名會員。自從土耳其申請成為歐盟成員之後，土耳其的社會學者更注重在西方社會學。
- 羅馬尼亞有激進社會學，想促進社會發展，領導制訂政策。他們越來越著重在微觀社會議題，但卻忽略了全球性問題，使得社會學變得有點孤立。研究機構減少了，但是建立了以網路為主的審查。
- 法國社會學會相當年輕，2002年成立，但是有1000名會員，40個研究組織。
- 葡萄牙社會學會有2600名會員，在社會與學術上都有其重要性。他們試圖想要把教學、研究和在企業工作的人聚集在一起。
- 芬蘭的西方學會(Westermarck society)於1954年成立，期刊於1965年發行。
- 瑞士社會學會有550名會員，20年來向來如此。該學會有12個研究委員會，在ESA舉辦會議的空檔也會舉辦會議。該會有多個官方語言，舉辦的會議有三種語言(法、德、英)，出版的期刊也是。
- 匈牙利社會學的組織規章最近歷經變革，現在並可以提出自己的研究計畫，並且每年舉辦會議。
- 奧地利有許多他們自己發明的職業，少了點整體的認同。博洛尼亞進程(Bologna process)導致了分裂，因為學士與碩士學位的内容差很多。
- 西班牙社會學聯盟(Spanish Federation of

Sociology)由西班牙各個地區的組織自發組成。各個地區的組織都會舉辦許多活動，也發行各種期刊。聯盟也定期辦會議，發行期刊。

- 有半數的英國社會學會成員和半數的社會學博士不在社會系教書。英國的學費政策變了，有許多大型的抗議活動。總之，唸書變得很昂貴。
- 義大利的大學正在經歷組織與財政的雙重危機。組織的部分影響為何，還很難評估，但是一提到薪水，財政問題有顯而易見。
- 在波蘭，社會學頗負盛名。其認同的地位在共產時期就建立起來，並且越來越多人想修讀社會學的學士獲碩士學位，這意味著來自其他領域，對社會學未必熟稔的學生都對它很有興趣。
- 塞爾維亞社會學會是非營利與非政府的組織。其研究計畫被財政問題與族群分歧所阻撓。塞爾維亞共有25個族群。
- 丹麥的各行各業薪水都很高，所以學術界有人才外流的現象；而且學術的標準門檻太高，學生要進入大學相當困難。
- 馬其頓社會學會很迷你，由主要的大學所組成，也有學術性的旨趣。
- 阿爾巴尼亞社會學會有130人，定期舉辦年會。
- 俄羅斯有3個社會學組織，都在莫斯科。社會學有一定名聲，且社會學家參與政策制訂。
- 以色列的社會學從1948年就建立了，社會學會規模很大，每年的年會都有1000人左右參加。

這就是歐洲社會學會的現狀！

> 到底社會學家犯了什麼罪？

by Frédéric Neyrat, University of Limoges



憲兵以及Pinar Selek

或許人們認為社會學已經是個成熟的學科，只需要提出科學的問題即可。但是，在Limoges最近的一場座談中，社會學所要面對的政治迫害成爲了重要的議題。社會學在其他領域(如政治學、媒體、法律)的非科學觀點中已經名聲敗壞了。

有兩個例子可以用來解釋社會學所遭遇到的麻煩。一定要提的就是Pinar Selek的例子。她從1998年開始就被控告用炸彈攻擊Istanbul的一個市集。所有的報告都指出爆炸起因於瓦斯外洩，而法院也3次宣告她無罪(最近一次是2011年2月)，但是檢察官還是不斷上訴，最新的這次也是。我想Pinar Selek所犯的罪，是她犯了挑戰了庫德族問題禁忌的罪。她訪問了PKK的

軍隊並且拒絕把名單交給警方，於是遭到逮捕和刑求。對於土耳其官方和警察而言，去質疑民族的神話，或是碰觸庫德族或是美國等問題，的確是犯罪行爲。

第二個是匈牙利的例子。新的民族主義針對Agnes Heller及其「黨羽」(其他4位哲學家)發起了一個仇恨與反猶的媒體戰爭，主要是因爲主流匈牙利媒體指控其有世界主義的陰謀。81歲的Agnes Heller是一位哲學家與社會學家，是Georg Lukács的學生。她在許多不同的國家教過書，1970年在美國New School擔任Hanna Arendt Chair，避免共產黨的迫害。今年初她和同事被指控不當挪用200萬歐元於模糊且無用的文章。這種未經證實的指控污衊了她的名譽，說她玷污了祖國的文

化。說穿了，這一切不過就是衝著她的政治行爲而來的。她和其他許多的知識分子一樣，堅決反對新的匈牙利律法，並批判Viktor Orban的威權統治。

若社會學家會如此無辜地遭到波及，那是因爲政權發現社會學對他們來說是一種威脅。社會學處理那些國家永遠忽視的議題，並且挑戰了政府文宣的真實性。社會學家總是被當成異議分子而被攻擊，即使社會學家是遵照著韋伯所說的學術倫理。所以，就是因爲社會學對科學的信念與承諾，才會被當作代罪羔羊。 ■